

中國區域發展的差異： 南與北

• 孫隆基

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一個熱門的題目是對「國民性」的討論。這個討論，較為一般人熟知的是從文化與國民心理的角度出發，少為人注意的是生理與地理的角度。前一角度多半離不了對儒家性質的研究，對專制主義或權威主義人格的批判，導致「全盤西化」或「中西文化整合」的結論。這些無疑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慣常的論述。後一角度，則會將批儒、崇儒問題變成無關宏旨。

白魯恂 (Lucian Pye) 在其近著 *Asian Power and Politics,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* (1985) 中提出一個命題：日本、韓國的儒家文化對現代化的作用是正面的，中國、越南的儒家文化對現代化卻產生反作用。這個命題無疑地是建築在一種價值判斷之上，反映出反共的偏見。不過，在另一方面，認為批判或者振興儒教就可以為中國前途找到一條出路的論點，也有「想當然耳」的嫌疑。

從清末至「五四」時代，在西方單線進化的觀念傳入中國之同時，「種族退化」(racial degeneration) 的學說也跟着傳入。如果從人種的角度看問題，如果把中國幾千年演變到了現在的種族看成是一種退化了的人種，那末，不論實行的是儒教，還是社會主義，都會朝着不良的方向變質。種族理論在二次大戰以前曾經在中國流行過。這類理論的漏洞很多，而且因納粹德國的失敗而失去信譽，成為自由主義學者忌談的禁區。

然而，中國近現代史上出現過的種族理論，作為歷史，仍有研究的價值。在20、30年代，還出現過種族理論與南北地理觀結合的學說。至於用南與北的角度談中國命運的，近年又重現於《河殤》電視片集裏。因此，有作一篇「南北論源流考」的必要。我們從產生學說的歷史現實背景開始談。

中國原本係一統「天下」，因此各地域性之間的差別就特別顯著，尤其是華南與華北，簡直有點像南北兩半球的對比。到了近代，南北之間的歧視仍然很強烈。

近代以來的南北對抗

在建立現代「國家」之前，中國原本係一統「天下」，因此各地域性之間的差別就特別顯著，尤其是華南與華北，簡直有點像南北兩半球的對比。到了近代，雖然出現了一致對外的要求，南北之間的歧視仍然很強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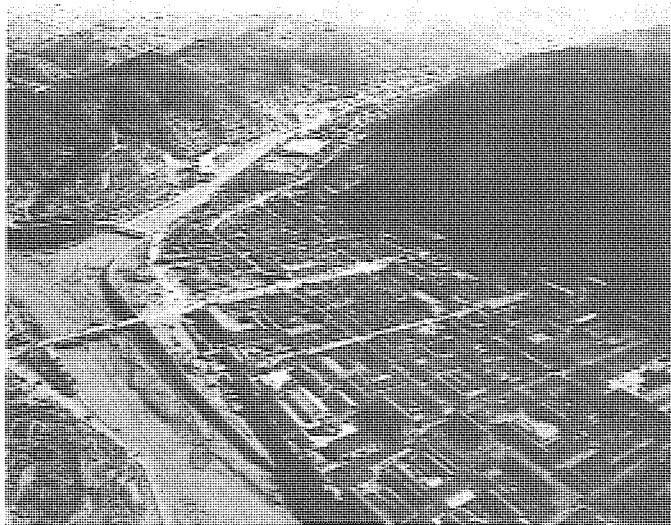
在1904年，一位政治評論員認為「成為千古未有之奇禍者，則莫如今日所謂南北之見是已。」他把當時朝野的所有爭執溯源至光緒初年朝廷南北兩派重臣之爭，「而南北之分一變而為滿漢之分，再變而為帝后之分，於是推之於外交，而有〔親〕俄〔親〕日之分，措之於政見，而有新〔政〕舊〔政〕之分。」南北仇視又因近日的「中央集權論」進一步惡化^①。

該論者把當時隱伏的危機看得很透徹。庚子之亂後，滿清政府的現代化措施是朝着「中央集權」的方向，如統一軍權、鐵路收歸國有等等，引起南方諸省的不滿。慈禧太后去世(1908)以後出現的皇族內閣，在漢人眼中又變成排漢的滿人反動。反滿運動很自然起於南方。早於1903年，陳獨秀在安徽即擬成立一國民同盟會，以「聯絡東南各省志士，……庶幾南方可望獨立。」^②，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的革命同盟會，事實上也頂多只包括東南數省的革命組織。

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果採取的是南方各省向北京宣告「獨立」的形式。中國之南北形同敵國，日人桑原鷺藏也作如下評論：「中國的北方人民，對於異族，不很排斥，……元末所起的反亂，清末所起的革命，都是從南方爆發，以南方成功的。」^③

南方雖然成功地發動了革命，其果實卻被北方保守的北洋系勢力篡奪。後來南方的革命勢力必須進行「北伐」(1926-27)。名義上統一中國的南方政權奠都南京。

雖然中國南方的文化，愈往後便愈勝於北方，但中共卻在延安站穩陣腳，征服全國。圖為延安鳥瞰和中國南方海島，1870年的香港。



在民國初年，北方的政治勢力雖然保守，北京卻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。這是由於北京是首都，又是北大的所在地，全國精英雲集的緣故。即使過了「五四」時代，北方背景的知識分子仍有歧視南方文化之傾向。周作人說上海的文化是「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，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。」^④周作人的大哥魯迅也視上海文人為「才子十流氓」^⑤。周氏兄弟其實是浙江人，但在北方住久了，而且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。周作人是源起於北京的文學研究會的會員。魯迅的「才子十流氓」則是暗指成立於上海的創造社。

當魯迅挖苦上海文人的時候，他本人其實已經遷居上海。在1933年，由上海的蘇汶和天津的沈從文發難，又爆發了一場南北文人相輕的「京派」和「海派」之爭^⑥。

北伐以後，國家雖然名義上統一，政治與文化中心都有南移的傾向，南北的敵對卻依然尖銳如故。北方在南人眼中已變成了落後與混亂的同義詞。極端的南方沙文主義可以廣州中山大學歷史教授朱謙之為代表。他在1932年發起「南方文化運動」，認為北方文化已經衰老，「要使中華民族不亡，唯一的希望，無疑乎只有南方，只在南方，即珠江流域。」^⑦

從另一方面看，南京政府從未有效地控制北方。青年黨的李璜在1929-31北上考察，覺得除東三省外，北方的生活程度大大不如南方^⑧：

更可憂者，是在精神方面，北人對於南人，在此次國民革命之後，懷着一種嫉視心理，革命而既以主義相號召，而要稱作「北伐」，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對金人，把北人當着異族看待，何況更將北京要改成「北平」呢！

李璜指出，北方對南方的離心很易為日、俄兩強鄰所乘。

日本侵略者確實把華北當作是一個特區，認為它將落入自己掌中的可能性大於歸向南京。中、日雙方之爭奪華北，終於導致1937年的蘆溝橋事件。但爭奪華北者不限於南京與東京。中國共產黨在華南失敗以後，也輾轉「長征」至華北。最後，中共以落後的華北為新基地，重建農民軍，待日本勢力在華北崩潰，蘇聯填補入東三省的勢力真空時，遂掌握了各種有利因素，由華北出發征服全國。

中共以落後的華北為新基地，重建農民軍，待日本勢力在華北崩潰，蘇聯填補入東三省的勢力真空時，遂掌握了各種有利因素，由華北出發征服全國。

近代以來的「南北論」學說

有了以上的歷史背景，當利於了解近代以來學術性的南北論之興起。這個論述，非始於近代，實源於傳統的經世學派。梁啟超在1902年的〈中國地理大勢論〉，仍有經世學派談「形勢」之餘味。但除此之外，觀點卻是全新的。他以中國大河流域皆東西向，因此造成南北的劃分，各異其風俗，甚至造成不同的哲學、經學、佛學、詞章、美術音樂傳統。中國歷史發展的重心是由北而南，黃河流域是古代中國之重心，自宋以後重心則移至長江流域，「江浙固今世文明之中心點也。」身為廣東人之梁卻看好嶺南：「自今以往，而西江流域之發達，

日以益進，……此又以進化自然之運推測之，而可以知其概者也。」^⑨

在1905年，與梁啟超打對台的反清派之《國粹學報》亦連載劉光漢論南北思想文化自古不同的長文^⑩。劉對中國愈到近代，愈南盛北衰的看法，卻基本與梁相同。劉認為南北地位之轉移開始於五胡亂華時代，而長江之水利便於黃河流域，也利於南方之逐漸發達，超趕過北方。

把中國化整為零為多元文明的作法，在近代實起源於梁啟超，殆無疑問。梁把中國分作黃河、長江、珠江三個地區文明，酷似他在另一文中把歐洲也整整齊齊地分作三個分支：「拉丁民族，其全盛時代在過去；條頓民族，其全盛時代在現在；斯拉夫民族，其全盛時代在將來。」^⑪力主中國文化起源一元論的唐君毅搖頭嘆息地說：「近人因受西方文化之來源為多元觀念之暗示，亦有論其為多元者。如梁任公先生極早即有中國南北二支文化思想之論……。」^⑫視其為始作俑者。

南北二支文化論確實可以推衍至極端的地步。矛盾在其神話研究中，仿照西方的希臘神話與北歐神話兩大系統，把中國神話亦分作南北兩系，並且連內容也去比附希臘與北歐的神話^⑬。林語堂在其名著《吾國與吾民》中則說：「華南人與華北人在氣質、體質、習慣上之差別，其程度可能與歐洲的地中海民族與北歐民族之差異相同。」^⑭

林語堂的《吾國與吾民》之首章即曰〈北與南〉，可見這個論點在當時的流行性。在40年代，一部研究古代史的著作也把古代中國分為「古典的」周文化與「浪漫的」楚文化^⑮。「古典的」與「浪漫的」本來是曹聚仁用來形容現代文學中「京派」與「海派」的用語。由此可見南北論之貫串古今。現代文學中的南北論，在40年代仍有人提起^⑯。夏志清在60年代用英文著述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中，還見用南北派別的角度來看問題。夏氏用老舍代表北派，其特色為「個人主義的、率直的、幽默的」，用茅盾代表「比較女性化的南方，浪漫的、感官性的、抑鬱的」^⑰。

南北論曾流行於一時，現在則不流行，也說不上對錯，可當作一種論述（discourse）處理。甚至把南北二支文化比附作地中海與北歐文化的極端例子，其出問題的地方，也不在中國文化的源頭應該是一元的，而是在於比擬之不當。西洋史自文藝復興以後，地中海區即逐漸被阿爾卑斯山北的地區之發展所壓倒。中國歷史的發展卻正好相反：最近一千年是一部南方興起、北方沒落的歷史。

這一點乃民國時代學者之共識。較著名的是丁文江的研究。他拿了二十四史上有傳的「歷史人物」，作了一個各省人才分佈的統計，求證宋代以前中國文化的重心在北方，而「江蘇、浙江兩省在南宋以後，變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」^⑱，做同類人才之地域分佈的研究者還有朱君毅、張耀翔、潘光旦^⑲，結論大致上與丁文江相同。

傅斯年曾指出丁文江的統計有問題，因為他把民國的省份作為單位，統計歷代的人物分佈，誤差很大。不過，傅指正的是丁的方法不够嚴謹，卻並沒有推翻南盛北衰論。傅本人則提出「永嘉南渡前為『第一中國』，隋唐以後是『第二中國』」的理論，並認為「中國歷史與中國人種之關係是很可研究的」^⑳。

南北論曾流行於一時，現在則不流行，也說不上對錯，可當作一種論述（discourse）處理。

外國人的「南北中國」論

在當時，南北中國論是國際學術界的共同看法。日本的桑原鷺藏也認為：「魏晉以前，中國文化的中樞在北方：在南宋以後，中國文化的中樞，完全移於南方。」他也利用科舉「登科者的多少」，作為一個地區昇降的「總風雨表」。他復指出：「中國北區野蠻的夷狄之侵入，和中國南區優秀的漢族之移住，……足以解釋南北盛衰的原因，……。」桑原的着眼點是為日本的大陸政策服務的，因此，別有用心地指出：「北方人的血，混雜了許多異族人的血，……所以中國的北方人民，對於異族，不很排斥。」至於南方，則「成為被夷狄侵劫所脅迫的漢族的避難場。……所以在南方攘夷保種的風氣很強。」^①

德國漢學家李察·威廉(Richard Wilhelm)亦云：「舊的中國文化充分發展為一種北方的形態，和一種南方的形態，……北方的文化形態配合於黃河流域。黃河的下流不能航行。愈近海濱，便愈加困難。所以這種文化似乎起源於大陸。要到後來，才達到東方和海。」^②

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泰斗費正清(John K. Fairbank)，在其著述的中國史教科書《美國與中國》裏，也是以〈北與南的對比〉開始^③。這一章主要談地理，例如說華北比華南乾旱，水的供應也比較不確定。

在其較近期為《劍橋中國史》寫的章節中，費正清發展出兩個中國論：「大陸中國」與「海洋中國」。他認為：中國自有史以來，都有一些邊沿文化與華北的核心地區並存着。在未與西方接觸之前，中國之西北邊疆，因造成蠻族入主中國的威脅，乃最重要的邊沿文化。來自這個地區的因素，往往加強核心地區的「農耕——官僚體制」之勢力。然而，自新石器時代起，一個「海洋中國」已



至 60 年代，夏志清依然用「南北論」來看待問題，以茅盾(右)代表女性方的南方，以老舍(左)為北派。

經開始發展，但「直至現代」，它都是「大陸中國的一個臣屬甚或邊沿性的附肢」。這個「海洋中國」指的是東南沿海地區及其延伸——東南亞的華僑。華北雖然也有海岸線，但黃河與淮河的出海口乃沼澤，既不宜航行，也不宜沿海居住，因此其文化是大陸性質的。費氏視滿清之入主為「內亞洲部落遊牧與半遊牧民族強化中國核心地區的反航海傳統」。但自從西方侵入以後，中國這個歷史形態已開始變動²⁴。

威廉與費正清有關中國地理方面的論述，到了今天看起來是常識。其實，用現代地理的角度對中國作出一個全局的看法，在前清同治年間才形成，奠基者是德國人李希霍芬男爵 (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–1905)。他從1868年開始，在華作七次旅行考察，行蹤遍各省，替民國時代丁文江的地質研究所的工作打下了基礎²⁵。

李希霍芬學派對中國地理、人種全局的看法是²⁶：中國南北的地質史，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南方的地形比較新造，因此北方是風成的黃土大平原，南方則為山地及其間的谷地，和長江一帶的堆積平原；北方少宜於航業的海岸線，南方海岸線凹凸曲折，實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多灣海岸；北方大平原鄰接中亞，受其沙漠風沙之吹襲，形成黃土，也造成河流中有大量的砂礫，冬季則因酷寒的西北風，造成寒冷與乾燥的氣候，南方的地形則是西藏大山脈的延伸，全無中亞的影響，由於來自西方的空氣很濕潤及雪水的關係，所以華南有全年水量充足的大小河川，便利航行。除了地理差別之外，南方的人種也較北方的純正。北方同化了許多塞北民族，南方開發較遲，從北方來的移民未及把先居民吸收同化，因此雙方面都保持其純正的血液。南方的言語也沒有北方那樣統一。四川方面，因早有由陝西移民過去，而雲貴一帶的漢族，都是從四川移過去的，所以北方語的勢力一直達到西南。但東南沿海多山的地帶就不同了，吳、越、閩、粵各有自己的言語，與中原語系不通，也互不相通。

北方人的血統比較不純，前述的桑原鷺藏有提及。丁文江也認為「經過南北朝人種混雜之後，北方的民族，決不是純粹的漢人」²⁷。這類種族理論在當時很流行，與優生學說也頗有關係。

優生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結合

在20年代末，興起一派把南北論與優生學結合的學說。優生學創始於達爾文的表弟戈爾登(Francis Galton)，在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盛行。與優生思想有關的「種族退化」觀念在清末已經傳入中國，變成報章雜誌上鞭撻國人不長進的口頭禪。優生學原理在中國獲得大量介紹，則在第一次國際人種改良大會(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)於1912年在倫敦舉行之後。在1916年，《新青年》的一位編輯李亦民介紹了這一次大會，並高度推薦美國加州與印地安納州已通過的「閹割法」，認為這是「防遏惡質子孫」的良方²⁸。

魯迅在1919年將中國文化比作祖傳的「先天梅毒性病」，並警告不長進的中國人父母：「將來學問發達，社會改造時，他們僥倖留下的苗裔，恐怕總不免

費氏視滿清之入主為「內亞洲部落遊牧與半遊牧民族強化中國核心地區的反航海傳統」。

要受善種學(eugenics)者的處置。」²⁹同年，丁文江有介紹優生學——他稱為「哲嗣學」——原理的文章。從1920年開始，魯迅的二弟周建人大量地發表「善種學」的文章，並成為這方面的專業人士。1930年，他發表了一本有關這方面的文集《進化與退化》，魯迅為其作序³⁰。

周建人的「善種學」，是廣義而且折衷的。他並沒有強調戈爾登派的優生學與孟德爾(Gregor Mendel)的遺傳理論之間的歧異。前者是建築在衛斯曼(August Weismann)的胚種細胞(germ plasm)說之上的，有泛遺傳論——亦即是認為智力、天才、愚劣、犯罪傾向、品格德性都可以遺傳——的傾向。孟德爾的定律只能說明單基因——某一簡單特徵——的遺傳法則。此外，衛斯曼—戈爾登一派的學說是完全否定拉馬克(Jean-Baptiste Lamarck)的有機體從環境獲得的特質可以遺傳的觀點，他們把環境的作用只限於「選擇」某些先天的特質，讓其可以生存並傳後，至於不能適應環境的另一些特質則不讓生存而遭淘汰。周建人的「善種學」則有濃厚的新拉馬克主義色彩，也強調後天因素。

「五四」時代的優生學思潮，除了折衷性之外，也不成為一種幫派，而被各路人士引用。周建人的長兄魯迅自不待說。搞古史與民俗研究的顧頡剛也喜歡談優生學，連陳獨秀在1920年轉向馬克斯主義的當兒，還認為「優種論」有一定的進步性³¹。

但是，到了20年代末，隨着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化與教條化，優生學也朝同一方向發展。它一方面受到前者的批判，影響已不像早期那麼廣被，另一方面亦凝聚成派別運動。這個運動的代表人物就是潘光旦。

潘光旦是主張遺傳乃全屬先天因素，把環境的作用只限於「選擇」與「淘汰」的正統派優生學家。他對中國的地理與歷史對人種的塑造之看法，基本上追隨美國的亨庭頓(Ellsworth Huntington)。亨氏是耶魯大學的地理學教授。當時，西方的地理學潮流也是由自然地理趨向人文地理，提倡環境勢力說，以及用地理去解釋歷史與政治³²。亨庭頓一派的人文地理學，則是與優生學結合的。亨氏於1934至1938年甚至身任美國優生學會(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)會長³³。

美國優生學會自從1926年成立以來，即從事限制非白人移民入境的運動，在白人之中，又從事限制南歐地中海民族之配額。這種偏見，與當時流行的北歐種(the Nordics)優越論有直接的關係。在觀念的家譜學中，文明產生於「北溫帶」的理論，可上溯至亞里士多德與約翰·洛克，在1902年梁啟超的一篇文章已有提及³⁴。這個「北溫帶論」，到了近代德國思想家赫爾特(J.G. von Herder)手裏，就開始出現歐洲中心的種族主義色彩。不過，「北溫帶論」不一定一直對白種人有利。在英國，戈爾登在優生學上的繼承人皮耳遜(Karl Pearson)悲觀地認為：既然「高級種族」只能居住於北溫帶，就不可能很有效地殖民於熱帶與亞熱帶，因此，到了最後，世界其他部分就可能被中國人、印度人、黑種人所侵佔³⁵。

認為北歐種的雅里安人(the Aryans)是文明的唯一創造者，南歐人是「退化」的種族，早期有英國人張伯倫(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)，後來有美國人格蘭特(Madison Grant)。後者是亨庭頓的同路人。亨氏倒沒有特別強調雅里安種族，他的北方優勝論乃認為是拜地理與氣候所賜。他認為：無論對工

魯迅警告不長進的中國人父母：「將來學問發達，社會改造時，他們僥倖留下的苗裔，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(eugenics)者的處置。」

皮耳遜認為：既然「高級種族」只能居住於北溫帶，就不可能很有效地殖民於熱帶與亞熱帶，因此，到了最後，世界其他部分就可能被中國人、印度人、黑種人所侵佔。

似乎任何大理論，應用到中國身上，都會造成「例外論」。從清末至「五四」時代提倡的達爾文進化論，結果變成去論證中國幾千年是一部「退化」的歷史。後來用唯物史觀去解釋中國歷史，也變成了「遲滯」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論。亨庭頓學派的北勝於南的通例，應用到中國身上，反而變成了去解釋在中國為何南方壓倒北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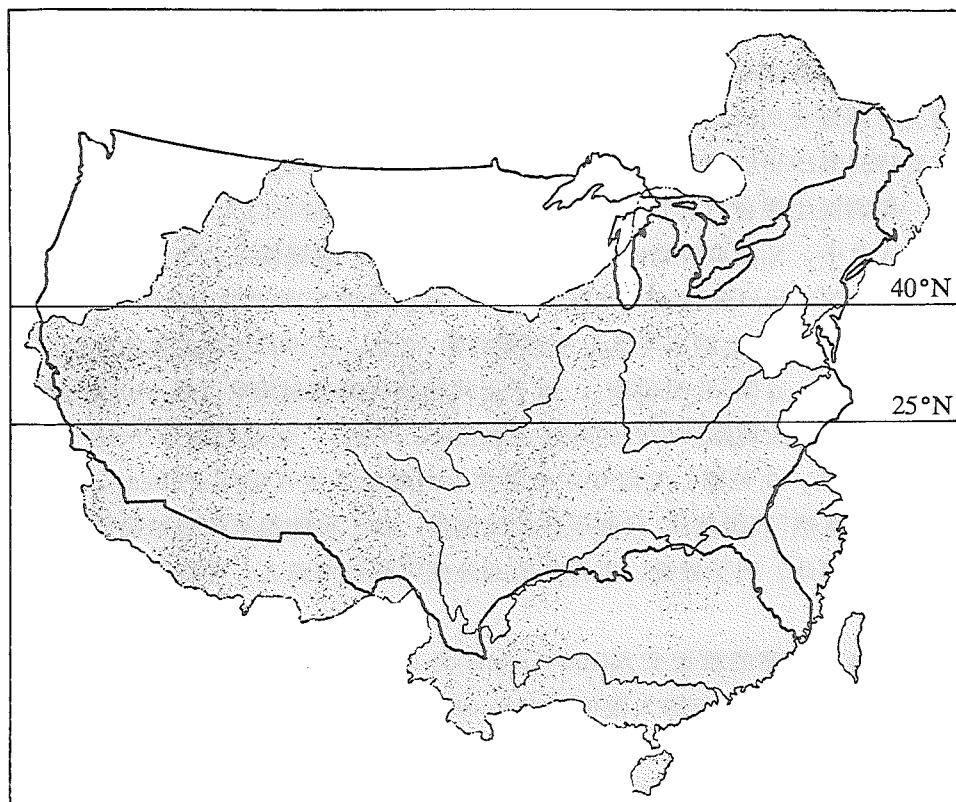
作或健康來說，最佳的氣候是「主要溫度很少降於最適宜『人類』心理的華氏三十八度之下，或高出最適宜『人類』體質的華氏六十四度之上」。因此，最理想的狀態存在於年平均氣溫五十度左右的地方，例如：倫敦、巴黎、紐約，以及北京³⁶。

南北地理觀的「種族退化」論

似乎任何大理論，應用到中國身上，都會造成「例外論」(exceptionalism)。從清末至「五四」時代提倡的達爾文進化論，結果變成去論證中國幾千年是一部「退化」的歷史。後來用唯物史觀去解釋中國歷史，也變成了「遲滯」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論。亨庭頓學派的北勝於南的通例，應用到中國身上，反而變成了去解釋在中國為何南方壓倒北方。亨氏說³⁷：

……但是中國的「南北情況」恰恰和普通所見的相反。通常同一地域之內，大抵緯度數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進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遜一籌。換言之，就是離開赤道較遠的要比較近的佔便宜。……這種緯度數目的大小和人文進步的遲速的關係，在歐洲、亞洲西部，印度，和北美洲都可以看出來。其在南半球，也是如此，……但是中國的人文狀況，卻是進步在南，而比較不進步在北。除了西洋人新近移殖的若干地段外，其他在赤道南北二十五度以內各地的人文進步，似乎沒有一處可以比得上南中國的。只此

亨庭頓認為，從北緯25度以北，尤其是在35度至40度之間，是人文凋敝的地區。中國的情況一反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。圖為中國與美國的地圖比較。



一端，便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確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一個民族了。但是從北緯二十五度以北，尤其是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間，那種人文凋敝的情形，除了亞細亞洲的中部以外，恐怕在全世界上也尋不出一個敵手來。

亨氏以華北鄰近歐亞大草原之故，後者的乾旱韻律週期性地驅使遊牧民族侵入華北。每一次大的蠻族入侵都造成漢族大量往南移民。華北的氣候又特別乾燥、缺水，常造成荒年。很不幸，黃河又是世界災情最重的河流，華北平原的地勢又特別平坦，易造成大水災。因此，華北是一個天災加上人禍的大災區。

每當中國歷史經歷一次這類災難週期，就產生一次「自然淘汰」過程。不能適應華北這種環境的無能分子先被消滅掉，剩下來的都是很能節省、吃苦耐勞，但也很自私很保守很短視的「消極的品性」。這個過程又「淘汰」掉身心兩方面發育最健全的女子。遇到荒年，她們總是最先被賣掉。如果賣入城市大戶人家，農村就損失掉這些因子；如果賣入妓院，整個民族就損失掉這些「做母親的最好的原料」。種種原因加起來，「中國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：中國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，……。」^③

然而，具有積極進取品性的人，則索性離開這個環境，他們往南跑。到了近代，另一個出路是往東三省跑。這類長途跋涉的移民旅程，也形成一種「淘汰」，能抵目的地者自然是體質最堅強，人最機智者。到了今日，南方比北方先進，而在北方，東三省也是比較先進的地區。

北方入侵的外族對於中國人的血統雖然也有貢獻，但是良性選擇作用一旦停止，或者征服者與自然選擇下來的消極品性之血統婚配，「退化的現象，退歸平庸的現象，就立刻可以發生」^④。相對北方來說，「華族南遷的歷程中，比較的沒有和土人發生血統上的結合，卻遲早往往把他們殲滅了。」^⑤南方的華族不只是最古老的，也是最經「挑選」的。亨氏認為「中國南方的特點，似乎是最純正的華人所造成的」^⑥：他特別看好經歷過幾次移民考驗的客家人，認為他們是華人中的精英。

亨庭頓與歷史學家端納(Frederick J. Turner)和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)都有交往。他的觀點有點似端納的「邊疆說」(frontier theory)，即美國民族性在開拓邊疆的過程中形成的理論。湯恩比在亨庭頓影響下，提出環境作出「挑戰」，文化作出「回應」的論點；他尤其強調「民族大遷徙」(Völkerwanderung)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。湯氏與亨氏的學說都有一點《舊約》中「選民」(the Chosen People)出埃及記的味道。例如，亨氏把華南的客家人聚落比作北美開發早期的清教徒聚落。亨氏對客家人歷史的敘述，也很像他筆下的猶太人的故事：今日猶太人來自猶達(Judah)與本傑明(Benjamin)二族，他們就是因為不像「失去的十族」(the lost ten tribes)一般與週圍其他民族混同，保持血統的純正，因此也維繫了「選民」的存在^⑦。

亨庭頓在中國的信徒，除了潘光旦之外，還有張君勱。張與潘一樣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。張歸國後任中國防癆協會的總幹事。他認為中國人是一個退化了的民族^⑧：

每當中國歷史經歷一次災難週期，就產生一次「自然淘汰」過程。不能適應華北環境的無能分子先被消滅掉，剩下來的都是很能節省、吃苦耐勞，但也很自私很保守很短視的「消極的品性」。這個過程又「淘汰」掉身心兩方面發育最健全的女子。遇到荒年，她們總是最先被賣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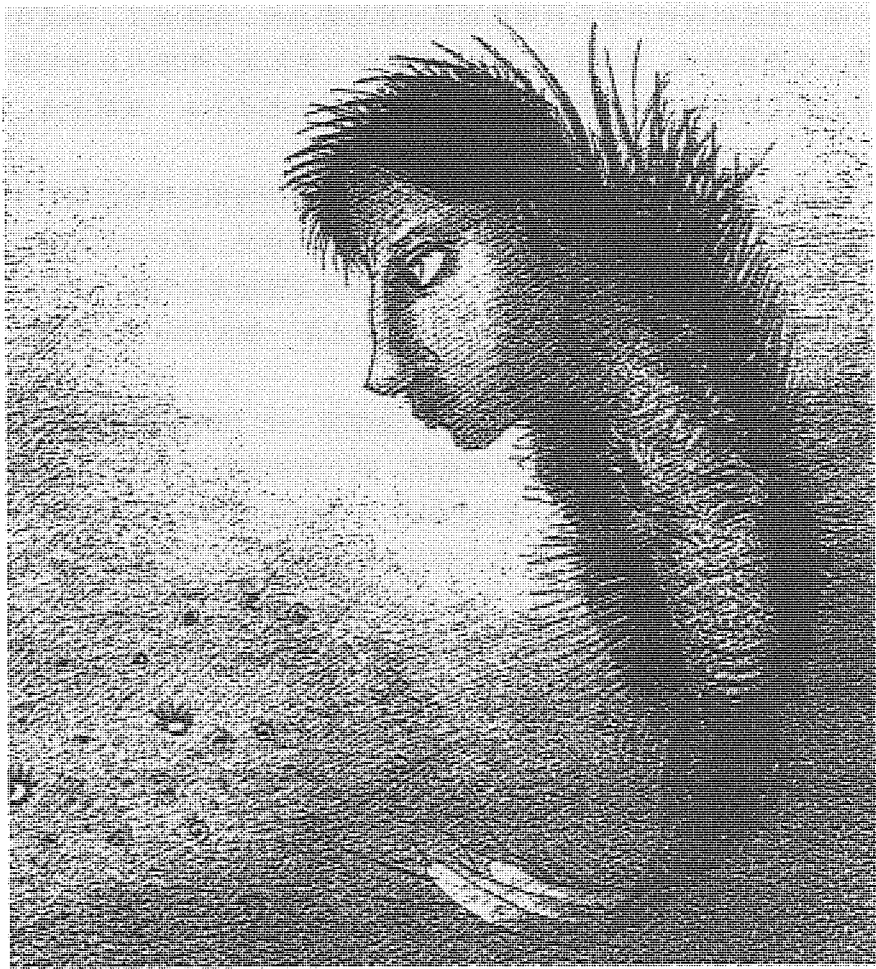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中國的種族論者認為，南方人與北方人的特質無法結合在一起，結果降低了整個民族的素質。中國民族是一個退化了的民族。

中國民族很少勇氣，全國男女皆呈一種虛弱的膽怯樣子，男子十有九皆帶幾分女性，故少雄赳赳的氣概。這種膽怯退縮的神氣，在在象徵衰老與病態。

張氏根據教育部對12,955名大學生的體格調查結果，發現即使這些民族精英，體格完全發育的「不到全數的二分之一」，不過，總的來說，北方的體格勝於南方^④，身高方面的統計數字也指出：華南不及華北^⑤。用壽命長短去衡量「生命力」(vitality)，其結果亦類此：南方的嬰兒死亡率高於北方^⑥。寄生蟲與疾病的繁衍，也是華南盛於華北。

另一方面，張氏根據丁文江、朱君毅等人的歷史人物地域分佈之研究，指出「長江流域七省的人物，超過南北中國〔指嶺南與華北〕一倍有多」，主要還是明代以後的劇烈增加^⑦。張氏的論點是：北方人有體格、缺智力，南方人反是，但兩者總無法結合到一起去，結果是降低了整個民族的質素。張氏諷過於黃河^⑧：

北方民族質量之退化，黃河應負最大部分的責任。中國民族之不振，亦是黃河之所賜，……須知北來之侵略，中國無法制止，實因黃河年年為災，

北方民族之南渡，以為脫虎口歸慈母，其實他們是脫虎口投獅口，他們逃入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長江流域，在這帶住久了，他們必流為饒具女性的民族。

摧殘了民族之體力與智力，故敵人可以乘虛而入的緣故。……現在請討論南方的衰老原因罷。北方民族之南渡，以為脫虎口歸慈母，其實他們是脫虎口投獅口，……他們逃入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長江流域，這便是自投羅網了，這個次熱帶的氣候，確不利於民族之生機與健康，任何體魄充實的民族，在這帶住久了，他們必流為饒具女性的民族。

黃與藍：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

70年代末期以來，馬列主義官學的勢力在中國減退，因此，重新出現對中國歷史不同的解釋。有些所謂新觀點，其實也是從前有人講過的。在1986年，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又提出該注意中國之內「不同地域，民族的文化」，藉以打破中西文化、或者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對比壟斷之局面^④。

對國內不同地域文化的注重，也是引起爭論的《河殤》電視片集之着眼點。它以色譜中的「黃」與「藍」，把費正清的「大陸中國」與「海洋中國」改了裝登場。它將中國的千年停滯怪罪於黃河，因為黃河文化是大陸性的、封閉於陸地的，落後的華北文化。藍色則象徵有一股與世界海洋匯合之衝動的東南沿海文化。

除了費正清的影響之外，《河殤》勢不可避免地帶有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色彩。它雖然揚棄了官方教條，却指涉及異端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、布哈林，以及維特福格爾(Karl Wittfogel)，換而言之，也混入了一點「亞細亞生產方式」論與水利專制主義論的貨色。

《河殤》在很大程度上援用湯恩比的「挑戰與回應」說。這個公式其實也被費正清用來解釋中國近現代史，說西方作出「挑戰」，中國作出「回應」。《河殤》則直接引用湯恩比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解釋^⑤：

環境愈困難，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就愈強烈，這是西方史學界的一個著名觀點。他們認為，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為古代中國的搖籃，可能就是由於人類在這裏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，比中國的南方，例如長江流域，要嚴重的多。人們潛伏的創造才能被挑戰刺激起來了。

在這裏，也反映出《河殤》製作者對自己的判斷力失去信心，反而要在自己的文明起源問題上，去信一個基本上不是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。已經有人指出：湯恩比的觀點「與地理事實不符」，因為在古代「長江流域是沼澤地帶，又為濃密的森林所掩蓋，但黃河盆地却提供肥沃的黃土，水利方便，樹木不多，冬季的氣溫也比今日宜人得多」。^⑥

《河殤》的兩個中國論也類似湯恩比的「第二中國」論。湯氏將中國歷史攔腰斬成兩截，前一截曰「中土文明」(the Sinic Civilization)，後一截起自隋唐，曰「遠東文明」(the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)：中土文明的地盤是黃河流域，遠東文明則也包括長江流域^⑦。其實，湯氏的「遠東文明」也是西太平洋區的，因其旁支還包括高麗、日本、越南。按照湯恩比的說法，中土文明死亡，「生」下了

70年代末期以來，馬列主義官學的勢力在中國減退，因此，重新出現對中國歷史不同的解釋。有些所謂新觀點，其實也是從前有人講過的。

《河殤》製作者對自己的判斷力失去信心，反而要在自己的文明起源問題上，去信一個基本上不是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。



圖 最落後最保守的華北民族性，與專制國家結合，互相加強，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龐大的「反淘汰」區。

遠東文明，正如同希臘文明死亡，「生」下了西方文明一般。但前一例案與後者有很不同的地方：在西方，古代的羅馬帝國瓦解了不能再復生，中國之遠東文明在其誕生期——即隋唐帝國——即被中土文明的「大一統國家」的「幽靈」所佔據^③。

講到「幽靈」，當然是指舊的拖住新的，已死了的壓着活的。《河殤》似乎也透露出這種訊息：東南沿海地區，在近代初期，本來也可以像西方一樣走上海洋文化的資本主義之路的，但是被中土的「農耕—官僚體制」所窒息：「流動、遷徙、貿易都被窒息了。土地和專制把中國人捆死了，幾百年下來，中國人怎麼還能懂得自由和貿易呢？」^④

歸根到底，《河殤》的說法也與亨庭頓學派的說法異曲同工。後者強調先天的遺傳因素，認為黃河流域長期以來是一個「反淘汰」地區，將優質品性消滅，或趕向南方，由華南再趕到南洋，以及世界其他地方。《河殤》則試圖用後天的文化因素去解釋中國的現代困局。從這個觀點出發，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：中國東南海岸雖然有積極進取的文化創造力，但被由巴比倫時代遺留下來的專制國家所負累，沒法獲得發展。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後，這個專制國家不只獲得加強，而且還與最落後最保守的華北民族性——亦即是從前以大寨、紅旗渠作為代表予以歌頌，近來則在《黃土地》、《老井》等作品中遭到批判者——結合，互相加強，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龐大的「反淘汰」區。

但是，《河殤》與亨庭頓、湯恩比等人的筆法頗為不同。它嘆息道：為甚麼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，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。這是一個更大的噩夢。它從驪山那座大墳裏不斷瀰散出來，充塞着兩千年的歷史空間。」它復悲嘆黃河從「孕育變成了肆虐，母親變成了暴君」^⑤。按照中國人的德性，即使

「母親」變成了自己成長過程中的枯枝，也無法將它鋸掉的。亨氏與湯氏筆下的思想感情則有一點《舊約》〈出埃及記〉的味道：離鄉背井者將獲得新生，留下來守着故土者則受到阻滯之詛咒。

註釋

- ① 錄光緒三十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初六日《時報》，〈論南北之成見所起〉，《東方雜誌》(10期，1904年12月1日)，頁233-40。
- ② 引自陳萬雄：《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(1879-1915年)》(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9，1982)，頁29。
- ③② 桑原隲藏，楊筠如譯：〈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〉，《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》(卷1，2號，1930，4-6月)，頁301-2；頁293，300，301。
- ④ 周作人：〈上海氣〉，《談龍集》(上海：開明書店，1927)，頁159。
- ⑤ 魯迅：〈上海文藝之一瞥〉，《魯迅全集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)，卷4，頁296。
- ⑥ 湯逸中：〈「京派」和「海派」之爭〉；朱正：《魯迅研究百題》(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1)，頁448-55。
- ⑦ 朱謙之：〈世界觀的轉變——七十自述(二)〉，《中國哲學》(4期，1980年10月)，頁492-3。
- ⑧ 李璜：《學鈍室回憶錄》(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73)，頁165。
- ⑨ 梁啟超：〈中國地理大勢論〉，《飲冰室合集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)，冊2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十，頁77-101。
- ⑩ 劉光漢：〈南北學派不同論〉，《國粹學報》，2，6，7，9期(1905年3月25日，7月22日，8月20日，10月18日)。
- ⑪ 梁啟超：〈歐洲地理大勢論〉，《合集》，冊2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十，頁101-6。
- ⑫ 唐君毅：《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》，台修訂四版(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82)，頁2。
- ⑬ 玄珠(茅盾)：《中國神話研究ABC》(上海：世界書局，1929)。
- ⑭ Lin Yutang: *My Country and My People* (New York: The John Day Company, 1935, revised in 1937), p. 17.
- ⑮ 李長之：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84，重印1946年版)，頁4。
- ⑯ 胡蘭成：〈隨筆六則〉，上海《天地》月刊(10期，1944年7月)，收於唐文標編：《張愛玲卷》(台北：遠景出版事業公司，1982)，頁173-5。
- ⑰ C.T. Hsia: *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*, 2nd ed.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71), p. 165.
- ⑱⑲ 丁文江：〈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〉，原載《努力週報》，摘錄載於《東方雜誌》(卷20，5期，1923年3月10日)，頁129；頁133。
- ⑲ 朱君毅的〈現代中國人物之地理教育與職業的分佈〉及張耀翔的〈清代進士之地理的分佈〉，皆載於《心理》(卷4，1期，1925)。潘光旦之〈武林遊覽與人文地理學〉在他的《優生概論》下篇(出版時地不詳)。
- ⑳ 傅斯年：〈評丁文江的「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」〉(1924)《傅孟真先生集》(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，1952)，卷1，頁96-102。
- ㉑ 悟生譯：〈東方與西方(德國理查威廉Richard Wilhelm所著《中國的精神》一書最後的一章)〉《學術界》(上海，卷1，3期，1943年10月5日)，頁14。
- ㉒ John King Fairbank: *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* (Cambridge, MA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48, 1958, 1971, 1983)。該書之1948年版的第一章是政策性的導論，〈我們的中國問題〉，在第三版後刪去，因此原本開始進入正題的第二章“The Contrast of North and South”正式變成首章。

- ② John K. Fairbank: "Introduction: Maritime and continental in China's history," in K. Fairbank, ed.,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*, vol. 12, part I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3), pp. 9-20.
- ③ Charlotte Furth: *Ting Wen-chiang: Science and China's New Culture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0), pp. 39-40.
- ④ 下文的綜括本於忻啟三:《我國南北方之地理觀駁》(《方志月刊》[南京, 卷8, 7-8合期, 1935年8月], 頁55-9。忻文沒有註出處, 因此有些地方是李希霍芬以後的新發展, 也可能有忻氏自己的看法, 故云「李希霍芬學派」。
- ⑤ 李亦民:《歐美人種改良問題》,《新青年》(卷2, 4期, 1916年12月1日), 頁1-4。
- ⑥ 魯迅: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》,《全集》(卷1, 1919年10月), 頁134。
- ⑦ 魯迅:《(進化與退化)小引》,《全集》(卷4, 1930年5月5日), 頁250-2。
- ⑧ 陳獨秀:《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》,《新青年》(卷7, 4期, 1920年4月), 頁7。
- ⑨ 胡煥庸:《西洋人文地理學最近之發展》,《地理雜誌》(南京, 卷2, 3期, 1929年5月), 頁1-8。
- ⑩ Geoffrey J. Martin: *Ellsworth Huntington: His Life and Thought* (Hamden, Connecticut: Archon Books, 1973), p. 184.
- ⑪ 梁啟超:《地理與文明之關係》,《合集》, 冊2,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十, 頁106-7。
- ⑫ Richard Hülstadter: *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* (Philadelphia: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, 1945), p. 160.
- ⑬ Ellsworth Huntington: *Civilization and Climate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15), p. 220.
- ⑭⑮⑯⑰ 潘光旦:《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》(上海: 新月書店, 1929), 頁25-6; 101; 22; 6-7; 47。此書係亨庭頓的《種族的品性》(*The Character of Races*) (1924)中論中國的四章之翻譯。
- ⑱ Ellsworth Huntington: *The Character of Races, As Influenc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, Natural Sele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* (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s, 1927), pp. 130-4。還恩比類似的觀點。詳Arnold J. Toynbee: *A Study of History*, vol. 2 (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34), p. 55。
- ⑲⑳㉑㉒㉓ 張君勱:《中國民族之改造》(上海: 中華書局, 1935), 頁168; 頁199-20; 頁56-60; 頁77-83; 頁30; 頁214-5。
- ㉔ 譚其驤:《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》,復旦大學歷史系編:《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》,上集(香港: 商務印書館, 1987), 頁27-8。
- ㉕㉖㉗ 蘇曉康、王魯湘:《河殤》(香港: 三聯書店, 1988), 頁14-5; 頁37; 頁79-80。
- ㉘ Raymond Dawson: *The Chinese Chameleon: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* (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, pp. 66-7.
- ㉙㉚ Toynbee, op. cit., vol. 1, p. 90; vol. 2, p. 120.

孫隆基 浙江人，生於重慶，在香港長大，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，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，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、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拔塔大學，現任職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學。著有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一書，備受學術界及社會注意。